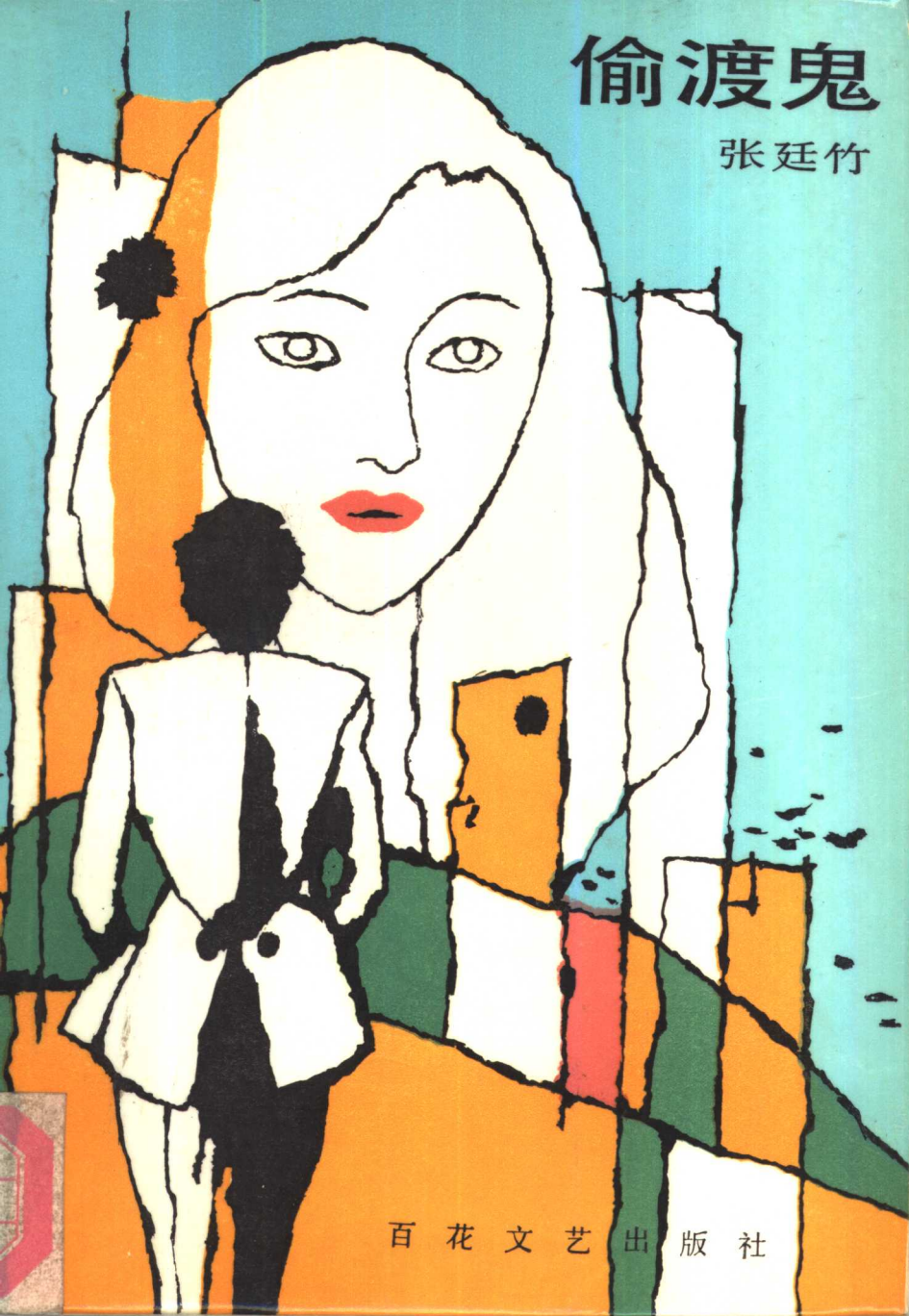


偷渡鬼

张廷竹



百花文艺出版社

I247.5
1072
2

张廷竹

偷渡鬼

百花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一个偷渡到香港的幸存者，与母亲同恋人隔海相望。母亲如血如泪地叙述着骨肉情，恋人如哭如诉地倾吐着苦恋的烦恼，幸存者更痛苦更烦恼的是背离了母爱，丢弃了恋情，变为一个越境的偷渡鬼……

小说以动人的情节，曲折的故事，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几对男女青年，有情不能相爱，有爱不能成婚的不同遭遇……

偷 渡 鬼

张 廷 竹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30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 1/2 插页2 字数220000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300

ISBN7-5306-0059-1/I·57

定价：2.55元

夜已经深了，万籁俱寂，我从箱子里又翻出这一叠信来。在我的思想里，孩子，总以为你还在那个既可怕又安全的世界似的。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早已回来了，而且曾经过家门而不入。是怕连累我们吗，十五？难道你没有想到这一点：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人们总是把我们跟你连在一起的，尤其是我，你的母亲……

我很好，妈妈。我在你们曾经生活过多年的这座城市里给您写信。您自然可以猜到这座城市叫什么名字，这里吹拂着亚热带的风。……到达这里的过程我就不说了，迟早您总会知道的。妈妈，请您放心吧……我吃过一些苦，现在已经好了，有了工作和住处。再说，我从小就学会了吃苦来着，我还怕什么呢？……

这是你离家后寄来的第一封信，我读过无数遍了。一拿起它，我的眼睛就模糊了，我的心也火辣辣地疼起来，

好象它在沸腾的泪水里煮着似的。有多少次，我希望这颗心能够随风飘去啊，飘到你所在的那个城市。我当然可以猜到这个城市的名称叫什么；虽然，我看了又看这信封上的邮戳和邮票的面值。邮戳上写着“中国广州”，邮票的面值是八分。我猜想这是你托哪一位朋友带到广州寄出的。你不愿意让周围的邻居发现我家的来信上贴的是伊丽莎白女皇的头像。孩子，我明白。是的，那是我和你爸爸“曾经生活过的这个城市”。那时，你外公和外婆都还没有过世呢。那时我是一个虔诚的教会中学的女学生。在我的印象中，那里的马路两旁耸立着灰色的和褐色的高楼大厦，五光十色的招牌林立。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到达那里的？我曾经读到过一张传单，上面写的是一个著名的音乐家从这里跑到那里去的经过。我觉得太可怕了，眼前老是出现一个黑魑魑的夜晚，波涛汹涌的大海，和军警们巡逻的灯光……

……我知道我是非常对不起您的，妈妈。对不起姐姐、妹妹和——爸爸。他现在还在“说清楚”吗？我猜想他大概是永远也说不清楚的了。他经历过的运动实在太多了。每一次都要“说清楚”，说到后来在我的印象中，“爸爸”这两个字都成了“检讨书”的同义词了。何况，现在又添上了我这么一个儿子，一个说不清楚的儿子……

我没有太多的语言要向他忏悔的。妈妈，你知道

我是从心底里不大看得起他的。还记得那时候吗？就是我在学校里被红卫兵打伤了的时候。我住在医院里，同学们都来看望我的时候。他们都是好人啊，真正的好人。——“右派”的儿子阿维，“老板”的儿子黄胖和“反动将军”的儿子阿西。——他们跟我一起遭到了毒打。他们心情激动地和我一起谈论着迟早他妈的要以牙还牙。他们对我说：“没关系的，十五，你很快就会好的，你是一条好汉。”他们亲切地摸摸我额上缝补过的伤口，还给我留下两只大西瓜。甚至平时很少跟我交往的几个女同学也来看我了，眼泪汪汪地要我“多多保重”。我是多么感激他们啊。我记得，您陪着姑娘们穿过医院的大厅和走廊，一直送到大门口。随后，您回到我的身边，摸着我的手上的绷带，一边哭，一边说：“孩子，你是对的，你是为了反对对这些同学的侮辱才受的伤，她们都告诉我了，真可怕。”

可是爸爸却跟我说：“你啊你，都跟些什么人交往？！”

他坐在我的床沿上，低着头，脑门上鼻尖上都沁出了汗珠儿，颧骨上居然还煞有介事地浮起了两块红晕。那时他还是“革命干部”，还在机关里当着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小头头”。他大概到学校里去过了，知道我反对的是些什么人：厅长的儿子和将军的外孙。于是他就发起火来了，发得象一条病恹恹的老狗

似的。我听着他的数落，凝视着他那潮湿的眼睛，抽烟抽得指头儿发黄的瘦弱、汗湿和发烫的双手，心想这是一个多么陌生的人啊。是的，妈妈。那天晚上我就产生了远走高飞的念头了，哪怕是到那里做一个鬼呢！我想得很多，我希望能够离开这个唯唯诺诺的父亲，离开那个“鬼见愁”的学校。因为我知道很快我们一家也要倒霉的。我们毕竟都是从罗湖桥那一边过来的人哪。尽管你们是一解放就走了过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我那时还不到一岁，……但是，谁又会因此而放过我们呢？“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孩子，我又在掉眼泪了。每次读到这里我都会忍不住掉眼泪。你是一个早熟的孩子，你懂得太多，也太早了一些。但是，你对你父亲的谴责是不公正的。至少，不十分的公正。那时，他这样数落你，正是因为他也预感到我们一家人又要倒霉了的缘故啊！你已经被他们打伤了，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你不知道外面的形势正在如何汹涌地变化着。红色风暴刮得每一户人家的窗户都在铮铮作响了，……人人提心吊胆，你却还在筹划着要进行报复，你父亲能不害怕吗？有一点，你说对了：你和你父亲是不一样的，你们的性格完全不同。

“你准备和他们一起插队去？”你父亲问你。

“是的，我要去，跟阿维、黄胖和阿西他们一起到三

门湾边去。”你回答说。

“可是你们学校有去兵团的名额，那里每个月有二十六元工资，过的是集体生活，离家也近些……”

你望着你的父亲。他接着说：

“学校里说，只要你改正了错误，他们就原谅你了。你知道，生产建设兵团是部队管的，政治上生活上都有人关心，能够上那里去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你说：

“好了，爸爸。也许象你说的，我到那里去会混得好些，可我……”

“什么？”

“我还是要到大海旁边去。”

“我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你确实是不大会明白的，因为你很少有可以肝胆相照的朋友，你已经不是那个意气风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来的年轻人了。我要跟能够互相帮助的人们在一起，看看辽阔的大海。再说，还有人求我帮忙……”

你把户口簿拿走了。你父亲抽了整整两盒香烟。屋子里烟雾腾腾，他在烟雾后面跟我说，你坚决要去三门湾正是“因为还有人求你帮忙……”

“多么愚蠢的感情！”他说，“十五完全晕头转向了，十八岁，他才十八岁呢……”

“你是指那个来看他，掉了眼泪的女同学雯雯吗？”我问。

“是的，我看着就有点不对劲儿。”

我沉吟起来了。我已经知道你是为了保护她才跟红卫兵们反目的。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孙女，父母亲在运动一开始就自杀了，爷爷奶奶在美国。红卫兵在学校的墙上挖了一个狗洞，要她每天从洞子里钻进钻出，她不肯钻，于是他们就用军用皮带抽她的脊背……你把皮带夺了下来。你跟他们对打。……我相信，你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种人类的正义感和同情心，但是后来却成了几乎是所有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议论的话题。

“你们看，那个臭资本家婊子儿养的女人雯雯，总算找到一个骑士啦！”

“哪个‘骑士’，岳王路82号里的那个小瘪三？”

“就是他。”

“小伙子长得蛮英俊的，成绩也不错。”

“还不是一丘之貉，都是有‘海外关系’的人。”

他们说的是你，我听了当然难过。你的姐姐、妹妹也一样的不好受。因为你姐姐正在跟她的班长谈恋爱，他是三代血统工人的出身，退伍兵。这个退伍兵听见街上的女人们如此嘲弄你，就放下了面孔对待你姐姐，说是跟她并肩在马路上走有辱身份了。你姐姐哭了。我很生气，而你的父亲比她还要狼狈似的。我觉得他的脑袋更沉重了，脖颈也更细了，一个脑袋老是耷拉在胸前，仿佛低于肩膀一样。每次走过路口街尾时，他总是加快了步伐，好象急着要去火葬场报到似的。

“这个龟儿子成了街坊邻居饭后茶余的话题，”后来他对我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想的，要做唐·吉珂德么？”

这是在你下乡了两个月的时候跟我说的，在晚上。天气很冷，屋子里潮腻腻地令人浑身不舒服。而且还停电，饭桌上点着一支摇摇晃晃的红蜡烛。我当时的脾气坏极了，因而冲着他说：

“唐·吉珂德总比只会逆来顺受的人要好，总有一点精神对吧？一个可怜的小姑娘到了穷途末路了，我儿子能够伸出手去拉她一把，这不是应该羞愧的事情。梦尘，我记得从前你也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呢，如今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我老了，背时了，”你父亲这样回答，又一次躲到烟雾的后面去了。那时，他抽的是劣质烟草，一股马粪味儿。“一位精神病学专家说过：‘人若在精神上崩溃了，那么肉体就失去存在的价值了。’”——他的话使我感到发冷。

雯雯确实是个好姑娘。她也听到了这些诽谤。从农村倒流回城的时候，她不敢上我们家里来玩。可是我知道，在集体户里，她又恢复了做人的尊严和少女的青春。她把一架旧唱机带到那里去了，唱片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那时急时缓、时弱时强的旋律，把你们带到了美丽而辽阔的原野。年轻漂亮的农村姑娘吉赛儿在农村小道上舒展着她那迷人的身躯。

她爱着伯爵阿尔贝特，她摘下花瓣为自己的爱占卜着……是的，阿尔贝特也疯狂地爱着她。

现在，我仿佛看到你还在三门湾边劳动，背着锄头，骑在老牛的背上颠儿颠儿地走过乡间小路。日头用温暖的光芒，照拂着稻田里复种的一片翠绿青苗。那儿空气清新，而维多里亚海滨那个大城市上空笼罩着的却是一百万辆小汽车的废气。一幢幢的大楼好象永远穿着被污染的牛崽服。是这样的吗，我的儿子？——我相信是这样的。你到罗湖桥的那一头去了，实际上就意味着你离开了生你养你的一切，你必然会陷入重重迷雾之中的。你难道不留恋这里的生活？那时，你爸爸虽然又一次进了“学习班”，但你毕竟已经回到家里来了啊！在家里待业。每天上午，我上市场，莎莎留在家糊着居民区送来的信封。她开着一只小半导体，一边听，一边唱。你姐姐佳娜早就搬到那个退伍兵的家里去了，在那里侍俸着她那好发脾气的婆婆。八时左右，报馆门口的阅报栏里贴出了当天的报纸，你就拖着一双软套套的海绵拖鞋去看要闻，看天气预报和电影广告。你到阿维摆的猪头肉摊儿上去帮忙，弄得满身都是油腻腻的；你又到阿西家里去聊天，去读他的也许永远发表不了的小说的新的一章。中午你回来吃饭了，莎莎给你盛一大碗白米饭，上面盖着一块肥肉和几片青菜叶子，你就坐到天井的无花果树荫下去，一边吃，一边跟墙门里的三干娘或者六外婆聊天。我不知道为了让你抛弃这里的生活铤而走险到海外去捞世界，你的同伙们曾经给你灌过多

少迷魂汤。我总这样想：你是为了寻找雯雯才下了决心的。

我拎着菜篮子回家，脸上堆着笑容，因为买到了便宜的新鲜小菜。我跟居民小组长点点头，脸上的笑容又恭谦又带点儿嘲讽，因为她虽然自以为是一手遮天但毕竟在你的回城问题上还是说过几句好话的。碰到那个在棚桥菜场卖菜的巧珍姑娘时，我摸摸她的肚皮。她怀孕六个月了，还象大熊猫一样的腼腆。小时候你曾说她胖得象只猪崽，我为此而用鸡毛掸子打过你的屁股。莎莎看到我回家了，立刻奔出家门来接过我的篮子去。看到她不爱吃的黄瓜和茄子，她就皱起了眉头，鼻梁上出现了几道小皱褶。

“妈妈，我送信封去吧？”她问。

“好的，把帐算清楚。”

她就到街道办的印刷厂去了。将糊好的信封送给他们，得到一笔菲薄的工钱。她比你小八岁，你插队八年回来，她正好十八岁了。她没有考上大学，不，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制度。第二年夏天恢复了，她就考上了医科大学，而你，却已经远走高飞……

假如你不走，你也能考上大学的。十年前，你才二十五岁啊，你的成绩又比莎莎她们好得多。

……妈妈，您不要为我担心，我身体很好，干的活儿也不是很重。虽然，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一天起码干十四个小时。但这是暂时的现象，刚来么，白手起

家，总要辛苦一些的。以后宽裕了，我要寄钱给您。
我还想学一点外语，英语和日语，我记得您也会说上几句的，可惜以前没有跟您学……

莎莎喜欢听广播，广播里有英语和日语节目。还有外文唱的歌曲，sing sing so, sing sing so, “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船儿随风摇荡……”这是《星星索》，印尼巴达族的民歌。……街上阳光灿烂，一个收旧货的人一边走，一边叫喊着招揽生意；弄堂口有人在刷新的标语了，不知道又有什么最新指示传来。人们交头接耳，悄悄地议论着中南海里的轶闻，说是伟人病得很重了，“红都女皇”有可能接过舵把。我不敢跟人谈论这样大的事情。自从知道我是“内控使用”的人物而在一怒之下离开了我的工作单位以后，我就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了。我不问政治。我走到门口时，居民区的治保主任斗鸡眼大妈把我叫到她家去，她第一百零五次问我：

“俞丽娅，你父母真的去世啦？你有十年没跟他们往来了？”

我猜想一定是又要在国庆节前搞一次治安情况调查了。我竭力压抑着内心的愤懑。我对她说（也是对自己说）：

“是啊，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连遗产都没去继承过一点！”

你却也关心起这件事情来。你曾经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象随便想到似的问我，外公外婆是一九六五年还

是一九六六年去世的，谁料理的后事？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哥哥名叫俞天杰，在澳门一家洋行里当职员。十年前他来过一封信，说你外公外婆在半年中先后去世了，他问我能否去一下香港，面晤一次。这封信，你爸爸交给了他的单位领导，并且着重说明俞天杰跟我是同父异母的兄妹，我们向来生疏得很。这倒是真话。那时我跟你父亲都很激进的，向往朴素向往真理，我们很少跟俞天杰见面，你父亲总跟我说，你哥哥身上一股的铜臭味儿，是个天生的买办阶级。

你坐在吱吱呻吟的小竹床上这样问我：

“外公以前是做买卖的，开一家小杂货店是吗？”

“不算太小，有时候还跟外国人做点生意呢。”我这样告诉你。

接着，就象在人事处里回答对我的履历提出的疑问似的，我向你交待了我的姑娘时代。我父母的家居住在九龙西洋菜市街同发大楼旁边，是一幢低矮的三层楼的旧房子。房子的三分之一属于我父亲所有。除了家人住的外，就是仓库和店堂。店堂里放着温州的花边，杭州的剪刀，英国的成衣和日本产的吸尘器，还有台湾的洋娃娃。四十年代的香港跟七十年代的上海在市政建设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住在那里的时候，舞厅，夜总会，酒吧远不象后来报上说的那么多。生活节奏也不那么紧张的。我记得，楼与楼之间隔着小块空地，有些地方还堆着垃圾，并不全是街心公园和花坛。现在，当然是面目一新，很可能再也看不出它的本来样子了。我说，你外公去世时七十岁了，

他是一个挺憨厚的浙江人，说一口杭州官话，属于知足长乐的那一类商人。于是你忧郁地笑起来，你说：

“房子和一点遗产就全归了舅舅。”

“舅舅”这两个字很随便地就从你嘴里出来，好象叫惯了似的，倒令我吃了一惊。于是我就提醒起你来，说俞天杰跟你外公不一样，是个沉默寡言的人。整天摆着一张办公室面孔，穿的西装一尘不染，在家里也无时不系着一条黑色的领带。我们都有些怕他。他反对我跟你父亲结婚，说你父亲是个靠不住的人，满脑子胡里花哨的念头。这时你突然爆出一句话来：

“他倒是很有点先见之明的！”

我傻了眼。我觉得你一下子变得陌生了。后来回想起来，觉得不难理解，你是有这样的思想基础的，你也认为我嫁给你父亲后，吃的亏太大了……可当时我却生气了。我批评你，说你不该讲这种话，你不理解上一辈人，也不理解你的父母。我的话大概说重了，你的眼神黯淡下来……从那天以后，你很少跟我交谈这些事了，有时什么也不告诉我。我也感到了后悔，本来，我应该推心置腹地跟你谈一次话的，或者还能让你把危险的想法都暴露出来，防患于未然。可是……我在夜里叹息着，自言自语：“唉，儿子大了……！”

“二十五岁的人了，还在广阔天地闯荡过八年，”你父亲说：“你还管得了他吗？在他看来，还认为我们理解不了他们呢。算了，我只希望他能尽快找到一个工作，然

后找个贤惠一点的女工结婚，算了……”

后来你父亲注意起你来了，那是在你做了几天临时工攒起一笔钱以后，你说要出门旅行一趟。你跟黄胖两人躲在阁楼上商量旅行的路线，一商量就是半天。你父亲对我说，他偶然发现了你的存款，居然有八百多块钱，他很吃惊。你是一个很节省的孩子，同时你也是一个知道家里困难的人，你怎么会拿着这么大的一笔钱出去逛荡呢？但是你说，你要去看看黄山黄河，长江长城，说不定还要去看看长白山和松花江，乘你待业之际散散心，增长一点知识，我们就只好再说什么了。我们一点没有想到你会南下，会去投奔那个根本是毫无瓜葛的舅舅俞天杰；你会轻而易举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你的姐姐妹妹和同学朋友，离开了许许多多的东西……

……但是，妈妈，我确实是非常的想念你们来着，想念西子湖畔的每一根小草和每一块石头。我忘不了这一切，我非常想念我住的小阁楼，以及我曾经在那里卖过苦力的南星桥货运码头。我在那里挣到过将近一千元人民币的血汗钱。假如不是五个月后就被解雇了的话，我或许会一直干到今天。阿维和阿西跑到那里去看我，在赤热的沙滩上跑着，高喊：“十五，你他妈的要钱不要命啦！”这话至今还在我的耳边回响，好象现在他们又来到了这里的海港旁边，好象有人从遥远的家乡把这些话送到了我的耳边……我还想起了

那个斗鸡眼的治保主任，想起她曾经在国庆节的晚上跑到我们家来，问我白天有没有到街上去看游行来着。我真担心她会不会从邮递员手里拿过这信封去拆开看看……妈妈，我是一个不肖子孙。“黄胖”也跟我差不了多少。他现在和我住在一起，每天晚上都眼泪汪汪的忏悔，说是对不起他那个当过老板的父亲，——红卫兵曾经逼着他打过他爹一个耳光。……妈妈，我一直没有打听到“他”的下落，……你知道这个“他”是谁……西洋菜市街的同发大楼还在，那幢低矮的三层楼房子却消失了……

不要以为我仅仅是为了“捞世界”，为了“搵钱”才铤而走险的。不，我离开你们的原因很多，很复杂，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几年，丑恶的东西看得太多了，我也变得丑恶了。钱不是幸福的源泉，但是幸福却需要钱，就好象人不能成为金钱的奴隶，但没有金钱人就可能成为奴隶一样。何况，还有一道又一道的紧箍咒，使人压抑到了极点的政治空气……我也不仅仅是为了寻找那个“她”出来的。当然，她是有错误的，她跟我不辞而别……可是天晓得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必须搞明白。

我是爱她的。虽然我从来没有跟人这样说过。她也是爱我的，我知道。他们，我总会找到的，那时你也会清楚的知道一切了，一切。